

东方映象 欧洲地图中的中国

东方，这一杰出的神秘之地，汇集着西方的梦想与恐惧。两千多年来，东方始终是欧洲商人、传教士和旅行家的理想目的地，因为这里可以满足他们对财富和知识的渴望。

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迷人世界，这里拥有丰富的资源，出产名贵商品、丝绸、宝石和香料。

在梦想的促使下，成群的航海家、探险者和旅行家失踪在茫茫的大海，无边的沙漠，和高山森林之中，都是为了能抵达这一神秘的传奇之地。这一地区在中世纪时被称为伊甸园。

地图、书籍、图画、天文工具、航海工具和地形测量工具等等，讲述着这一充满成功与失败的漫长旅行，同时也成为西方与东方交流的平台。正是旅行的故事推动人类继续探求和追寻更为尖端和天才的技术和工具。

还不仅如此。地图还展现了数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形象在欧洲文化中是如何改变的，这两个世界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以及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知识与文明的进步。

在欧洲跨文化对话年举办之际，博康西利奥城堡迎来了这一展览。该展览由特兰托卫匡国研究中心主办，博康西利奥城堡博物馆和特兰托自治省书籍与档案文物局协办，目的是向公众介绍欧洲与中国文明间的碰撞与交流。

古代

在古代，地中海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巨大盆地。

居住在地中海岸边的人们对在沿地中海和在内地进行旅行、探险和商贸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一不停歇的寻找的目标，就是东方，因为那里是珍贵物品、香料、香脂、珍稀宝石和丝织品的来源地。

在草原与山脉的那一边存在着另一个广阔强大帝国的想法，在古罗马也很盛行。然而，商人和旅行家带来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尽管传播广泛，但却总被认为是传奇故事而引起怀疑。

古希腊人、腓尼基人、古埃及人的旅行经历，以及天文研究，让古希腊地理学家得以描绘出“世界范围”（**ecumene**），其字面意思就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地方”。示意图包含两条垂直的轴：一条基本纬度线横穿过整个地中海；一条基本子午线，穿过罗德岛，通往两极。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早在公元前3世纪，埃拉托斯特尼就计算出了非常接近真实数值的地球直径。随后，在公元2世纪，托勒密绘制出了一幅经纬图，根据这幅图，可以确定每个重要地理物体的位置。

古罗马人出于实践的目的绘制了地图，引入了符号体系，这在《罗马帝国地图》——中世纪的一幅道路图中有相关记载。

中世纪

由于古罗马帝国的衰败和新城邦国家的建立，在中世纪的最初几个世纪，欧洲持续动荡，政治分裂。在地中海各国，从摩洛哥到波斯，伊斯兰教的扩张形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语言和宗教共同体。

各国人民，各种文化开始相互交流与碰撞。

从 11 世纪起，欧洲商人重新开始前往地中海东岸地区经商，与来自中亚的商队取得了联系。

东方以其珍贵的异国产品引发了旅行家和商人的好奇心和兴趣。经历了长达 24 年的旅行的马可·波罗，也许是探索这一遥远国度的最杰出的探险家。这个国度如此不同，如此神秘，人们只能通过传奇和幻想故事去了解它。在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中，他准确描述了那些充满神奇的地方，向与他同时代的人，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一种崭新的文明。

当时的地图反映了人们恐惧和不安的感情：那片土地上住满了魔鬼和残暴的生灵，恐怖地预示着人类的灭亡。这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图指向东方，以耶路撒冷为中心；远东地区是伊甸园；而在中国以北，则是歌革和玛各之国，即世界末日的恶魔。

与这些地图不同的是，由商人绘制的地图则显得更加实际与现实。通过与阿拉伯航海家的交流，通过马可·波罗等航海家的远征，通过中国人在 12 世纪发明的指南针的使用，西方商人获得了有关“东印度”地区或“香料之国”的更为详细和有用的地理信息。

文艺复兴

现代社会的最初几十年里，人类和人类的能力得到了重新认可，人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也重新变得浓厚起来，并被看作是一种进步的表现。15-16世纪，许多发明和发现让人类达到了世界和知识的新高度。

得益于一些新工具的引进和完善，如等高仪和航海象限仪，以及对纬度的更精确计算，欧洲航海家开始在更广阔的大洋中进行探险，超越了中世纪人因为无知和迷信以及技术无法达到而没能跨越的界限。东印度继续成为通过新的航海线路抵达的目的地。1492年，哥伦布在一次航行中偶然发现了一片新大陆——美洲。葡萄牙航海家开启了通往中国的新的海上直航路线，令抵达中国变得更为便利。

地理探险和新大陆的发现迫使制图学家不断地对地图进行完善和修改。他们延续了中世纪航海指南和航海图的传统，却只限于描绘港口和海岸，对内陆地区只做了寥寥介绍，如城市、矿山、丝绸或香料等名贵产品的生产地等。

印刷术出现后，这一中国人的发明也被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引入了欧洲（1456年），使得更廉价、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的地图得以出版和传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由奥特柳斯绘制的地图集，以及由墨卡托在新的计算和新的投影技术的基础上绘制的地图。

17 世纪

旅行和探险并不只是商人和航海家的特权，同时也是属于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早在中世纪，在“蒙古和平”时代，就有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受教皇或法国国王的委派，以外交或使节的身份到中国北方进行传教活动。

到了 17 世纪，前往东方的传教士主要来自耶稣会。耶稣会是于 1534 年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成立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教义，让新大陆上的人们改变宗教信仰。

耶稣会士是第一批掌握本地语言，并且出版了真正双语字典的西方人，也是最权威的了解中国地理和文化的人群。利马窦，在奥特柳斯地图集的基础上，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其中展示了中国制图学达到的很高的技术水准。在 1600 年版本中，该图共被印制了百余幅，中国成为了全图的中心。

耶稣会士中也包括特兰托人卫匡国，他是《中国新地图集》的作者（1655 年）。他收集、筛选和总结了大量准确详尽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中国官员为税收而记录的有关人口、土地和资源方面的信息。那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国新地图集》都被认为是在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最值得信赖的作品。

从特兰托到中国

耶稣会士卫匡国，17 世纪伟大的探险家

在众多探索中国的伟大欧洲探险家中，也包括 1614 年生于特兰托的耶稣会士卫匡国。

在这个日耳曼帝国和意大利半岛交汇的城市里，他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在这个活跃的商业地区里，居住着来自多个国家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曾是特兰托耶稣会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后被派往神圣的罗马神学院学习，在那里的老师们的帮助下，他前往遥远东方传教的想法逐渐成熟。

在中国，卫匡国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国家和她的文化，并亲眼目睹了她从明朝向清朝的艰难过渡，并且都记录在了他的作品《鞑鞑战纪》中。

他是第一个系统并且满怀崇敬地接近中国地理制图学传统的西方学者。在他生活的时代，中国地理学家们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利用这些知识，特兰托耶稣会士卫匡国得以完成对这个广阔的亚洲国家的原始描述，在一些主要的中国作品的基础之上，配合个人的观察和研究，写就了《中国新地图集》一书（1655 年）。正是这部作品的面世，使得欧洲学者对中国的地理、历史、语言和风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8 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着人类知识的各个方面，从艺术到文学，从法律到经济，从科学到技术，当然也包括地理学和制图学。

西方科学家仅仅以得到确认和被实验证明的事实为基础，而将所有没被直接实践所验证的内容排除在外。在地图中的描绘部分中，有关魔鬼人民、想象中的植物和动物、以及还未被人们认识的地点的内容都消失了。制图学家更喜欢把未知地区或那些只有部分被开发的地区留白，以便在随后的地图版本中进行完善。世界上每个还未被认识的地区，都成为待开发、待认识、待殖民的空间。

最能引起欧洲人好奇心和认知渴望的民族里，就包括了中国人。也许因为这个民族显得闭塞和不可捉摸。由此，“中国产品”成为真正的时尚。一切来自中国或让人联想到中国的东西都是精美有趣的。陶瓷、香料和茶叶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中国文化展现出的深刻智慧及其精致性和杰出性，让人们开始质疑始终以老大的自居的欧洲文化的地位。

19 世纪

19 世纪，中国作为大市场和原料产地成为欧洲人争夺的焦点。英国强制向中国出口印度鸦片以换取中国茶叶，并和美国、法国等组成联盟，迫使中国皇帝签署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开放了中国的数个港口进行自由贸易。从此以后，中国沦入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这也影响到了制图学的发展，地图变得主要以沿海地区和贸易基地为主，对内陆地区很少提及。

地图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因为地图是他们确定领土扩张路线的最好帮手。在政治家、战略家、商人或船主的办公室里，地图都在帮助他们确定路线和制定步骤以建立或加强他们的统治。

东方魅力

纪念品与中国产品

东方文化与艺术对欧洲人所产生的吸引力，既表现在人们对这些遥远国度的旅行和探险上，也表现在对异国物品的寻找和收集上。

从 18 世纪到今天，整个欧洲对“中国产品”的收藏始终在进行着，展览的最后这一部分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里展示的物品样式繁多，包括花瓶、印刷模具、天文仪器、陶瓷、鸦片烟斗等，都是东方风格的物品。

各个时代的扇子、祭祀用品和青铜器等都是阿尔科的圣母玛利亚修道院的收藏，均来自 20 世纪初的前几十年间在中国传教的方济各会士。

中国官员权力的代表和标志是青铜和玉制作的权杖、玉玺和清朝的官帽包头，均来自私人收藏。中国古代官员是指朝廷的高级官员，包括内务和军事官员，也有欧洲传教士被授予过官员头衔，其中就包括卫匡国。官员的级别和权威都在官服的质量和装饰上有体现，服装上绣有各种标志，配有明确不同等级的宝石和搭扣。